



1997年第六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香港
受邀在“饮水思源”座谈会上发言

陈六使先生倡办南大 及其对新马华文高等教育所作的贡献

翁世华

受邀在1997年第六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饮水思源”座谈会上发言

今年正好是陈六使先生冥诞一百周年，全球南大校友聚集在这里，一同齐心合意来追思悼念我们这位南大的倡办人，不仅是意义深重，而且也是一种饮水思源、蒙恩感报的具体表现。值得大家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远道一行！

是的，陈六使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不平凡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他创下凡人所不能，或能而不为的千秋大业。

他是一位大智者，虽然未曾好好地受过教育，却又非常重视教育，珍惜教育的一个奇才，为了教育，他当仁不让，慷慨解囊，挥金如拉屎，（引用他自己的话说“出钱如属放屎”），而且凡是有关南大的事，都必亲力亲为，全力以赴。甚至惹祸上身，开罪当局，也在所不惜。在一般常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既不明哲，也不善保身的老土。是的，就凭他那股老土的傻劲，和与生俱来的豪情侠义，他创下了足以名留青史，后世流芳的一番轰轰烈烈的教育事业——他倡办了我们的母校南洋大学，他配称为海外华文高等教育的大功臣。他在东南亚这一大片土地上，播下了中华文化优良的种子，培育出了王如明同学所谓的“中华文化优秀的基因”。

最难能可贵的，是由陈六使先生所倡导在万般不利的逆境中，拨巨资，尽全力，以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与魄力，创办了南洋大学。从而形成并塑造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南大精神”。至于“南大精神”的定义是什么？两年前在云南园南大40周年庆典过后，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论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其中詹子义同学说是“海外华人寻求在新马保存和发扬宏大其子孙和语文以建立华人族群完整性的共同愿望”。有的人更把它的义界广泛地引申，扩大到：凡是跟南大或南大校友有关的种种善行，义举，团结力啦，凝聚力啦，互助合作的精神啦，不屈不挠、不畏不缩、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求生、求存、求进的精神等等，“咸把郎”都归属之于“南大精神”。子义同学说这是“南大精神”一词的滥用！

虽然如此，真正的“南大精神”之伟大可爱处，足以动天地、泣鬼神，确实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肯定。包括某些新加坡政府的部长，连李光耀资政也曾经在某个聚会时非常珍惜地赞叹说：

“假如丧失了南大精神，新加坡社会就有麻烦了。”不过李资政所指的“南大精神”究竟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极费思量，说来话长，不是这里一、二十分钟可以交代得清楚的。同样，我今天所要讲的话题，是“陈六使先生倡办南大及其对新马华文高等教育所作的贡献”，也是一篇大文章的题目，不可能在一、二十分钟之内交代得清楚明了的。我只能大题小作，简单扼要地概括说，南大开办了25年（1955-80）总共栽培了廿一届，一万多名毕业生，其中，不少扬名海外艺术界之外，在新马的政治、经济、工商、文教各个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南大的成就可以说是超越了当初陈六使先生创办南大的宗旨与目标，不仅已为新马华文中学解决了严重的师资问题，而且还为新马的大专学府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教“子”人才，甚至连加拿大、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台湾、香港、日本等著名的大学里，也都有南大校友在任教，这也是当初陈先生所始料不及的。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倡办南大，为的是要给新马国家社会培养建国起家的专门人才的创校宗旨的落实与彰显。

此外，在这个座谈会上，我只能长话短说，用一种取巧的手法，以个人的亲历其境，身受其惠的虔诚，来现身说法，拿个人的实际经验，来作为论文整体的个案见证，

以饮水思源，感激南大对我的栽培养育，并向她的倡办人陈六使先生献上感恩！

我之所以这样说，也还有两个特别的用意，其一是给我这篇论文，或是今后有人要写类似的文章提供实例，以用作注脚；其二是跟我有同样处境的同学很多，特别是早期的同学，假如没有南大，就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更何况是后来还有一片大好的前途！因而对母校，南大及其倡办人陈老先生，都有饮水思源，感恩言报的意愿和心声。诚如王如明同学所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陈六使先生就没有南洋大学，没有南洋大学就没有南大生”。对我来说，我还得补充一句，没有陈六使先生和南大，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还说什么大学士，硕士和哲学博士的学位。换句话说，今天这个社会里，就没有我翁世华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所以我义不容辞地要为陈六使先生所作的贡献出来作见证，当然，诚如以上所述，陈先生对新马高等教育所作贡献之大，是无法用任何货币单位或度量衡标准来加以的评估、衡量的，而我的见证，也只能是一个小小的注脚而已。

打从1955年初，南大第一次为先修班招生而举办的甄别考试时说起。当初如果南大当局是按照一般大学的招生规章，规定申请入学新生必须要有华校高中三毕业证书的话，那么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报名入学。因为我只有初中三毕业的资格，和一张小学在职教师训练班的结业证书。我要感谢南大的是，她网开一面特别为像我这一类的职业青年多开了一道入学之门。由于考虑到当时中国大陆变色，

新加坡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中学毕业后不准到那里去升学，去了的就不能再回来，此外到台湾去深造的路也还没有启开；再说有许多因为家境清寒，或是特殊原故无法修完高中课程，就得进入社会工作的青年。他们无法进入大学，可又超龄了多年。于是当局就在第一届新生入学考试的报考资格里增加一条，凡有和高中同等学历者，也可报名考试的条规。饮水思源，我要感谢南大，我就是凭这条条规，和许多高中毕业生一同报名参加入学考试。

接着，就发生了林语堂校长一批人接受了30多万元的遣散费，全体离开南大的不幸事件。南大委员会紧急开会，成立了七人遴聘小组，立即进行聘请校长、教授、讲师的工作。另一方面，进修班也在6月15日，分别在华中、中正开课。年底结业考试及格者得以正式入学，而我也就跟这一批同学，连同1956年3月初入学试及格的录取生一同齐步进入了南洋大学。饮水思源，我得再次感谢陈老先生和南大赐给我这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虽然侥幸进入了南大，但是我的前途并不像一般同学的那末通顺，平坦。而是极其坎坷曲折的。首先是经费的问题，我实在没有来源，毫无着落。因为既要读书，我就得辞去小学教师的工作，没有分文的收入。感谢南大，她特别为了和我有同样困境的同学，在各个行政、服务部门设立了“工读生”的制度，让有需要的勤苦学生申请。秘书长潘国渠（潘受）先生批准我在图书馆工作，每天三小时，每月工资90元，这就解决了我每个月的学杂等费用。

可是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滋味，并不是好受的，我必须出卖生命健康，透支我睡眠的时间，来维持我四年的学业。这样还不够，因为每月90月的工资，交了学杂费，膳宿费就没有着落了。于是我就利用每年的长假到马来亚柔佛州的峇株华中教书。因为当时马来亚华文中学师资非常缺乏，很容易找到代课兼课的工作。这样，连续两年，都到峇株华中去教一个学期的书，筹备经费，而后回南大来上课、赶课、补课。就这样，搞到我精疲力尽，因而积劳成疾，就在最后一年毕业考试的前夕，最后关头我病倒了。不得不停学入院治疗。天无绝人之路，在院方每天给我打针、吃药、护理之下，我的病情大有起色。考虑到我的情况特殊和需要，以及合理的请求，基于道义的理由和病情的许可，院方就在我的病床旁边安了一张书桌，让我一边医病，一边准备毕业考试，我要感谢南大的是，校方准我申请出院两周，参加毕业试，之后再入院继续我未完的疗程。就这样我方能免遭苦读四年，而功亏一篑之殃！而我不能不向陈老先生和南大献上我由衷的感恩吗？

南大给我的栽培、养育，恩同再造。1959年毕业后，1960年南大中文系请我留系担任助教。接受了四年系里老师的细心督导和培训之后，我学得去克服千辛万苦、离妻别儿到海外去深造，因为创办之初，南大还没有设立研究院提供高级学位课程，而我之所以有机会到英国去深造，被大学东方研究学院Durham University Schillo of Oriental Studies，接受攻读其高级学位课程，而且还聘请我担任院里中文组的兼任讲师，开设两门荣誉学位课程，还得感拜

南大之赐。因为我只凭新加坡政府不承认，而海外大学却重视的南大所颁发的学位，最终还换取了一个当时很教人另眼相看的英国大学的硕士学位。

我得饮水思源，向陈老先生和南大感恩奉报的东西，是笔所不能胜书，会所不能尽述的。为了时间的关系，这里只提最后的一项，那就是我的博士学位，也是南大所颁发，赏赐的！说到这里，我还得感谢在座的黄丽松校长的成全。因为当时如果没有他那崇高的学术威望，没有他那办事的雄才大略，没有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英勇抗拒舆论压力的胆识，南大研究院就没能成功地办得起来。那时我们的南洋大学只能停留在一间初级大学的地位，始终都未能发展提升为一间既提供高等教育而又培养从事学术研究专才的完整的大学了。

在黄校长一手大力筹划之下，南大研究院终于在1971 / 72学年度宣布成立，分别在文、理、商三院各设一个研究所。招收硕士与博士学位研究生，为了申请注册撰写博士论文，我辞去了亚洲文化研究所（后来改称为人文社会种子研究所）助理所长的职位，集中精力与时间，一方面继续担任中文系讲师的教学工作，一方面潜心作研究，终于在1995年把博士论文写成，通过口试，和当时从台湾来的同事胡楚生先生，同时获得南洋大学中文系所颁发的第一届哲学博士学位。可惜的是，黄校长没等到给我的博士文凭签名，就提早离开南大到香港来当港大校长了。这使我的学位文凭失去了许多光彩！

总而言之，由以上所述，足见我的一套完整的华文高

等教育，我的一套完整的大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也全是拜陈老先生和他所倡办的南大之所赐。换句话说，我的整个略能放出一些光辉异彩的学业兼事业前途，也全都是他老人家跟他所倡办的南大所赐，我能不饮水思源，能不蒙恩言报吗？谢谢大家！

1997年12月20日（星期六）